



农民视角的工农联盟

——基于马克思法国史“三书”的考察

袁富民 索静雨

[摘要] 工农联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由于农民作为政治性力量被忽视甚至曲解,工农联盟的理论实质长期被遮蔽。农民作为政治主体生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迁,以普选权确立其政治性存在,通过“勋业”展现其政治性力量。以生产方式透视农民政治主体的内在规定,可以发现农民作为群体主体的张力结构,即农民在封建社会解体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崛起的农业生产变迁中所展现的结构制约性与主体超越性的张力结构。在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农民能够意识到其作为受资本剥削的“未来无产者”地位并能够与工人形成共同的阶级认同与阶级行动。因此,工农联盟是工人和农民基于社会生产的政治联盟,是需要作为无产阶级现实化主体工人与农民阶级自觉的阶级联盟。

[关键词] 工农联盟;农民政治主体;张力结构;阶级自觉

工农联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也是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工农联盟经常被阐释为工人与农民的利益联盟,这种观点虽不算完全错误,却未能把握住工农联盟的理论实质,以致农民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长期处于边缘甚至遮蔽状态。“以利相交,利尽则散”。如若以利益为基础建立联盟,工农究竟基于何种共同利益或根本利益确立联盟无疑是不能回避的理论问题。此外,由于马克思对农民“一袋马铃薯”等负面评价被错误解读,农民的主体地位遭到漠视,导致农民成为工农联盟的工具性存在。工农联盟历史必然性与主体选择性的内在统一关系遭到质疑。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简称为“法国史三书”)中以生产方式透视社会转型的理论视角,聚焦农民政治主体在封建社会解体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崛起的农业生产变迁中的历史生成与内在张力结构,从而揭示工农联盟的阶级性实质。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人民主体’的阶级性与历史性研究”(20BKJ005)。

[作者简介] 袁富民,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索静雨,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一、普选权与“勋业”：农民政治主体的历史生成

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农民始终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2009a:509）。然而，农民登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舞台并展现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其社会主导地位而历史性生成的。

（一）普选权：农民作为政治主体的存在

农民作为政治主体存在的外部合法性借由普选权的出现而确立。法国农民的选举权源于1848年的二月革命。二月革命是奥尔良王朝选举改革浪潮的爆发点。“人们当时经常将20万选民的数字与20万官员的数字进行比较，好像在暗示性地指控内阁已经通过职位的分配收买了每一张选票”（罗桑瓦龙，2005:219）。这一看法使选举改革的呼声成功地将政治上的不满与社会要求集中到一起。人们期待通过改革而建成一个没有政治垄断和腐败且尊重民众普遍利益的廉洁政府。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于1830年创办的《国民报》经常批判大资产阶级寡头统治和选举税造就的政治垄断，“不好的议会、不好的法律以及无产者的困境，均来自这种垄断”（罗桑瓦龙，2005:218）。资产阶级共和派肯定普遍选举对社会困境的改善作用，认为普遍选举能够使“腐败变得不可能或不起作用：它将以紧密团结的大众取代了这类扩大了资产阶级的少数派”（罗桑瓦龙，2005:219）。

然而，普遍选举作为一种民主权利为大众接受时，也聚集了从温和到激进的各种各样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声音和主张进一步促使选举改革范围扩大。到奥尔良王朝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提出了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地位的诉求。但是，国家政权在当时资产阶级上层的运作机制却越来越封闭，意味着不可能依靠统治阶级内部改革来打破封闭的政权，而需要借助外部冲突来实现。这时，“两起世界性的经济事件”（马克思，恩格斯，2009b:84）引发了法国的经济危机。1847年，经济危机全面爆发，法国的国内政治越来越向左倾斜，革命化的趋势逐渐增强，阶级矛盾愈演愈烈。资产阶级王朝反对派发动的“宴会运动”成为向奥尔良王朝发起的总进攻。在取得推翻奥尔良王朝的胜利之后，资产阶级试图独占革命果实的野心越来越明显，长时间没有对共和国作出任何声明。当时拥有绝对武装力量优势并且斗争意识大大增强的无产阶级渴望建立真正的社会共和国。1848年2月25日，巴黎无产阶级工人代表团在拉斯拜尔的带领下举行了大规模的威胁运动，临时政府恐惧无产阶级的力量，迫于压力宣布成立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共和国的成立和随之而来的普遍选举的实施，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共和派为自身贴出民主主义招牌，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使其不至于对资产阶级

政权造成严重危害。不同于资产阶级共和派仅要求实现共和国的纯粹主张,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了建立能够保护其利益不被大资产阶级侵害的普选权共和国的政治诉求。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赖德律·洛兰的推动下,临时政府通过了关于实行直接普选的法令。法令规定所有年满21岁的成年男子可以在没有任何能力或税金限制的情况下应召参加议员选举。选举法的通过意味着以纳税为标准的选举制度寿终正寝。农民隐匿在“3300万无产者的队列”(罗桑瓦龙,2005:221)之中,他们没有主动参与二月革命的斗争过程,却被二月革命取得的成果赋予了政治权利。

因此,随着普选权的确立,农民以庞大的人口基础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被裹挟进法国的政治生活。法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史专家罗桑瓦龙(2005:284)就此指出,“普遍选举的出现突然改变了政治生活的重心。1848年之前,虽然法国人口中农村人口占了四分之三,但政治生活却集中于城市,尤其是集中于巴黎。一切随着1848年3月5日的法令发生了变化,虽然舆论的动向、政治生活的创举和舞台仍然集中于城市,但决定权从此却属于农村”。

(二)“勋业”:农民政治主体的决定性力量

波拿巴复辟帝制,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标志着法国1848年革命的落幕。恩格斯将这场马克思称为笑剧的历史性事件称作农民的“勋业”(马克思,恩格斯,2009a:509)。农民通过参与整场波拿巴复辟事件,而自发地向世人展现自身极具重要性的政治力量。

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评论的,“普选权已经把那些在法国人中占绝对大多数的名义上的所有者即农民指定为法国命运的裁定人”(马克思,恩格斯,2009b:86)。然而,身为农民的绝大多数暂时并不具备成熟地行使这样一种民主权利的能力和知识,“在自由派和社会主义派这两个使巴黎和临时政府分裂并时刻处于互相对立状态的阵营之间,将由外省通过其选票来做出裁决……这些选票所支持的将不是革命,裁决将由缺少文化,或是受显贵们操纵的农村大众做出,其注定是反社会主义的”(杜比,2010:962)。路易·波拿巴利用选票的合法性,通过欺骗农民和其他各阶级的人,一步步达成了复辟的阴谋。农民在波拿巴的整场冒险行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法国农民及其消极保守的态度和蒙昧且被动的状态,波拿巴的预谋一定不会成功。在波拿巴通过巧妙的操作而掌握行政权、战胜立法权、拉拢军事权的过程中,农民以其数量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选票合理、合法地帮助波拿巴取得了胜利。

手握选票的农民是易于操纵的。在乡镇地区的选举活动中,经常出现政府控制农民选举的情景,直到第二帝国时期还有划分选区、设置官方候选人等被认为是操纵选举的现象出现。然而,农民支持波拿巴的根本原因,是对共和国的憎恨心理与对“拿破仑观念”(马克思,恩格斯,2009c:569)的追随。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一成立,就在农民的头上新增了“四十五生丁税”(马克思,恩格斯,2009b:94),此举对农民的利

益产生了较大冲击。法国多地爆发了农民的抗税斗争。与现实处境相对勘的是对过去的追忆。路易·波拿巴大肆宣扬的“拿破仑观念”之所以得到农民的狂热支持,是因为在拿破仑一世统治时期,小块土地的“恩赐”确实是法国农民的美好回忆。关于小块土地的迷信加之顺从权威、崇尚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共同造就了法国农民的一种固定观念,“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马克思,恩格斯,2009c:567)。毋宁说,19世纪的法国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大部分都是文盲,并且由于“外省”的地理位置和依附性社会身份的低姿态而长期被排除在政治事件之外。他们既没有机会参与政治,也对自己小块土地生产之外的事情不感兴趣。

帝国的成立让人们反思了政治问题,并将目光对准“被动地充当了第二帝国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2009d:194)的农民。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正是“保守”“愚蠢”“迷信”和“偏见”的法国农民。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进步人士来说,农民支持之下的复辟给他们带来的沮丧情绪更加明显和深刻。他们对人民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甚至带有蔑视的情绪,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仍然在共和派文学作品之中出现。茹勒·费里在一份题为《1863年的选举斗争》的战斗文献中,把农民描述为“迷信、天真、没有教养、不懂得任何政治含义、消极服从的人”(罗桑瓦龙,2005:285)。共和派将农村的人民与城市的人民作出相对立的划分,批驳农民的落后和无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农民看作缺乏独立头脑和政治自主性的粗俗之人。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揭示了农民“根源于农村生活闭塞状况的冷漠态度”(马克思,恩格斯,2009a:509)。法国农民就是以这样一种冷漠态度彰显了其作为政治力量的存在。

二、结构制约性与主体超越性:农民政治主体的张力结构

马克思提出的“保守”“愚蠢”“迷信”和“偏见”与恩格斯描述为“冷漠”“过时”的评语一度成为理论界对农民评价的圭臬,甚至有学者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看法一直不是正面的”(何丽野,2010)。这种观点无疑没能把握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的评价是基于生产方式透视社会变迁的总体批判视角,以及封建社会解体同时资本主义崛起的历史语境,错误地将农民基于小块土地所有制所形成的政治主体自发性作为农民本质规定,没能认识到农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型过程中能够展现出的主体超越性。

(一) 结构制约性:基于生产方式的结构化主体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展现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思路:生产方式作为历史发展的真正线索,其演进与发展规定了历史的发展,而借由生产方式确立的阶级是个人或集体活动背后的真正历史主体。农民在获得普选权之后成为政治主体,但这种政治主体以封建社会解体同时农业资本主义形成为基础的。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2009e:9)。农民首先是立足于小块土地从事生产活动的经济主体。他们以私有小土地的经济生产活动嵌入宏观社会结构,体现出一种结构化主体的制约性。但是,对农民所受结构制约的分析不应该局限于具体社会事件,因为社会结构作用于主体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交织。因此,我们需要承继马克思看待农业生产的视角,将其带入从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确立到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制度不断演进的过程中进行长时段的历史考察。

《拿破仑法典》规定了土地作为生产资料不受封建势力侵犯的新土地制度,“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马克思,恩格斯,2009c:569)。马克思将法国农民的土地私有称为“‘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恩格斯,2009c:569),而“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与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2009c:569)。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农民是夺取政治权力的新兴资产阶级通过规定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用来对抗封建贵族的阶级工具。私有小土地不仅是对农民的优待,而且本身也有利于巩固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演进,封建的压迫逐渐转变为资本的压迫,城市高利贷者的抵押债务取代了封建领主的封建义务。私有小土地带来的分散状态,以这种所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奴役而导致的贫困,以及小生产本身决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共同造就了农民生活的隔绝状态。而这种隔离状态反过来又加重了农民受资本的奴役。

从依附封建势力到受资本奴役的社会身份转变并没有改变法国农民的困境,农民政治主体表现为历史所呈现的“行政权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2009c:567)。千百万农民拥有同样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事同样的经济生产活动,即零星分散的生产资料和孤立的劳动。总的来说,就是“使他们互相隔离”(马克思,恩格斯,2009c:566)的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造就了法国农民“非阶级”的阶级性。这种特点使他们无法“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马克思,恩格斯,2009c:567),从而无法代表自身。农民在选举活动中的状态和选举波拿巴、赞成政变与恢复帝制等一系列保守选择都根源于其政治主体与经济生产的内在联系,即是由深受资本排挤和压迫的落后生产方式决定的。农民在沉重的抵押债务和赋税下的生活状态每况愈下,以至要失去自己的小块土地而破产。但是,他们把破产的原因归结于失去了小块土地占有,而不是资本主导的小块土地所有制。

农民政治主体的结构制约性是双重的。第一层次是“‘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带来的“拿破仑崇拜”,一种封建臣服传统影响下的历史性观念。这种历史残余阻碍法国农民获得与其经济主体地位相匹配的民主权利意识。“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2009c:471)。第二层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农业重构后形成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结构制约。法国农民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击却无法认识自身的被剥削状态,作为政治主体而展现出消极

状态。因此,农民政治主体既受到封建意识形态的束缚,又嵌入在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结构中,从而被动整合进了现代政治中。然而,这只能说明主体在结构制约下的历史生成与社会再生产,并不能说明农民主体性匮乏。

(二) 主体超越性:农民政治主体的“能动发展”

农民被动整合进现代政治社会的历史结果就是波拿巴以农民的政治力量为基础创造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但历史不会就此停顿。以法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演进为背景考察农民的发展态势,农民政治主体以其超越性的能动发展,展现出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必然趋势。

法国经济社会在整个19世纪经历了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从19世纪20年代到法兰西第二帝国终结,法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推进得以全面展开并最终完成。法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根基是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一基础构成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农村内部稳定的经济结构。自然经济模式也阻碍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渗透。帝国时期,交通运输业的变革和工业化成为刺激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决定因素。其中,“19世纪中叶是法国工业化的重要时期”(许平,2001:48),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冲击着农业生产,传统的小农生产向现代农业转变。法国农民参与生产方式变革并获得改造,进行了政治社会化,不断展现政治主体的能动性。

农业机械化的兴起带动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稳步增长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农民与市场发生了直接联系,并且作为生产者进入了更大的流通领域。以物质生产能力的普遍增长为基础,频繁的、普遍的、日益增多的商品交换活动彻底改变了生产者与市场不发生直接联系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系。面向市场的生产活动使农民的经济收入不再拘泥于土地而变得更加多元。这一现象不仅减少了农民对农村经济的依赖,而且削弱了对农村共同体的依赖。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广泛的市场参与意味着农民的生产越来越多地面向城市,农民得以与现代城市生活接轨。城乡之间内在联系的加强使得农业生产进一步卷入现代社会。总之,基于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等因素同样有利于农民政治主体的积极性发挥。

农民政治主体自觉意识的发展,转变了以往为领主和教士的马首是瞻、对地方行政官员的意志唯命是从的状况。学校教育、农业信贷、社会服务,尤其是报纸杂志和政治宣传等一系列以现代文明为依托的公共设施进入农村。农民建立起新的社会机制,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体系。其中,乡村教育为引导农民理解现代政治作出重要贡献。农民在经济、精神和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帮助他们更好地超越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构制约,进一步促进政治主体的能动发展。在选举活动初期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弃权、盲目追随和易于操纵的投票行为明显减少,19世纪60年代末,这种情况基本消失。19世纪70年代,农民在选举期间谈论政治,谈论共和派,谈论征税和农业贸易保护等问题。农民开始关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并且学会把自己的实际要求

与选举权利结合,而不再一味地追求虚幻的“皇帝”的庇护。《马赛纲领》获得农民支持,说明农民获得了灵活行使自身政治权利的民主意识,是这一阶级从自发走向自觉过程中的积极转向。

马克思在讨论主体与结构的内在关系问题时,自觉地以生产方式为理论视角,拒绝将“主体先于自己存在的思想和主体通过经验建构的思想对立起来”(维沃尔卡,2017:34)。虽然人们总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马克思,恩格斯,2009c:470-471),但是人们毕竟是能够创造历史的主体,而不是被历史结构所决定的消极存在。以社会生产视角洞察嵌入在结构中的主体,马克思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历史主体的选择性统一起来。因此,农民政治主体虽受到结构性制约,但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农民也能够超越原初结构而不断地能动再生产出新的结构性存在。

三、工农联盟的阶级性: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与阶级自觉

通过对农民政治主体历史生成与张力结构的考察,我们认识到农民作为同样被资本剥削的主体能够与工人形成无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联盟的基础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即消灭产生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绝非一般的经济利益。对于工农联盟来说,消灭一切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历史使命还需要作为无产阶级现实化主体的工人与农民的阶级自觉。因此,占有小块土地生产资料的农民,能否意识到自身在无产阶级化,形成阶级自觉无疑成为工农联盟的关键。

在整个 19 世纪下半叶国际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动荡和变化之中,马克思虽对农民所起作用的认识经历了几次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以生产方式为视角对农民未来无产者身份的确信,以及对联合农民必要性的坚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农民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必须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但作为中间阶级会“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2009e:41),从而“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马克思,恩格斯,2009e:42)。农民一旦认识到自己“将来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2009e:42)而转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他们对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便带有革命的性质。马克思对 1848 年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不彻底的工业革命导致无产阶级对自身革命力量的误判以及对中间阶级力量的忽略,一切不成熟的条件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这场失败也促使马克思重新认识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马克思,恩格斯,2009b:89)。

马克思从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出发多次强调团结农民的必要性,但他并非从服务于革命的工具性角度看待农民群体,而是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基于农民视角进行革命策略的制定。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认同公社的胜利是农民的唯一希望,因为公社重视“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马克思,恩格斯,2009d:162),“是唯一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就能立即给农民带来莫大好处的政权”(马克思,恩格斯,2009d:202)。之所以在涉及工农联盟思想的重要文本中以物质利益为联结工人和农民的纽带,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看到了农民的利益和需要是农业生产方式变迁的物质体现,指出了农民向无产阶级革命靠拢的必然性。

实际上,工农联盟中所规定的“农民”是一切工业无产阶级天然同盟者的农业工人和作为“未来的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2009a:513)的农民。工农联盟是现在的无产阶级与未来的无产者的联合,是农民无产阶级化后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资本迄今为止用来支配农民的一种符咒;是资本用来唆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借口”(马克思,恩格斯,2009b:160)。生产方式转变的深化意味着从事小块土地生产的农民最终面临的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失去自己私有的小规模土地,最终成为“与城市雇佣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 prolé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2009d:202)。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看到了农民作为“未来的无产者”的特点,从而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战略目标。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有能力改变农民在资本主义转型下遭遇的困顿,“把他们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他们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实际所有权”(马克思,恩格斯,2009d:202)。因此,工农联盟需要的是农民的阶级自觉。一旦农民拥有了这样的自觉意识,他们就能够成为“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马克思,恩格斯,2009c:570)。

农民的阶级自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农民还没有认识到小块土地所有制是他们受到资本奴役而难以生存的根本原因。农民虽获得民主选举权,拥有了政治表达的机会,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无产阶级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深化,农民首先能够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而突破封建传统政治观念。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宣传教育和合作社示范等手段使农民逃离他们那些“伪保护者”的控制和剥削,走出作为“人为促成的错觉和传统的偏见基础”(马克思,恩格斯,2009d:201),而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斗争将进一步激发阶级自觉,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此,农民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制约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束缚,基于共同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与工人形成工农联盟。

工农联盟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既被原则性坚持又呈现创新性演进。“列宁正是通过对工农联盟的重视和对工农联盟正确策略的运用,领导俄国工人阶级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在保卫和建设无产阶级政权的过程中使工农联盟理论获得新发展,从而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理论”(肖存良,2020)。鉴于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国情,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毛泽东,1991:692)。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际,毛泽东(2003:1375)首次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公开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一步丰富了工农联盟理论。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工农联盟的阶级性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在中国必然焕发勃勃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将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工农联盟也展现了强大的包容性和高效的组织力,确保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和谐有序。因此,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工农联盟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杜比,2010. 法国史. 吕一民,沈坚,黄艳红,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何丽野,2010. 马克思在农民问题上的思想变化及其意义——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段删节说起. 马克思主义研究(1):78-83
- 罗桑瓦龙,2005. 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 吕一民,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2009a. 法德农民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2009b.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2009c.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2009d. 法兰西内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2009e. 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1991.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2003. 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维沃尔卡,2017. 社会学前沿九讲.王鲲,黄君艳,章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肖存良,史少毅,2020. 发生、演进与差异: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理论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22-31

许平,2001. 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19世纪—20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

Farmers' Perspectives on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Alliance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Marx's "Three Books" of French History

YUAN Fumin SUO Jingyu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alliance, an important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has been covered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the neglect and distortion of peasants' political power. Peasants, as political subjects, emerged from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They established their political existence through universal suffrage and demonstrated their political power via "meritocracy". By analyzing the internal regulations of the political subject of peas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mode, we can find the tension structure of peasants as the collective subject. This tension is characterized by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subject transcendence exhibited by peasants during the disintegration of feudal society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method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hange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capitalism's transformation, peasants can recognize their status as "future proletarians" exploited by capital and form a shared class identity and unified class action with workers. Therefore, the alliance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is a class-based alliance founded on social production, and it needs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of both workers and peasants as the real agent of the proletariat.

Keywords Workers and peasants alliance; Peasants' political subject; Tension structure; Class consciousness